

第一章 緒論

中國的崛起，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與警覺。值得注意的是一個綜合國力日益強大的中國，無論是在經濟上的成長所構成一個相互依賴日深的經貿鍊，抑或軍備的提昇，從「神六」發射到漢級潛艇衝破第二島鍊進出太平洋，其客觀的對外幅射能力，均已大大強化，無一不引人注目；令人警覺不安的是，一個具有強大能力的國家，其國際行為模式與許多先進大國南轅北轍，意圖難以令人難以理解。中國對其自身安全環境的認知與國家新安全觀的形成是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要觀察重點。

中共近年針對自身安全環境認知所形成的新安全觀，冷戰結束後，美國戰略思想與作為的變遷，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其中以美國不斷介入其他國家紛爭最令中共憂心，尤其 1999 年 3 月美國繞過聯合國對科索沃的武力干預¹，並發生中共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中共擔心美國往後援例介入台海紛爭。所以中共主張在裁減軍備、多邊對話、不率先使用武力及經由和平談判解決爭端的基礎上建立新安全觀²。

而中共自 1949 年建政以來，除 1950 年大力投入韓戰以外，亦曾與鄰國發生多次邊境衝突，70 年代末還出兵越南。惟短暫懲越戰爭後，即積極改善與周邊鄰國關係，近 30 年來未曾再與外國兵戎相見，基本達成鄧小平提出對於維護和平、穩定周邊環境的主張。但在地緣安全戰略上，中共認為北韓核武危機、南海問題是比較棘手的區域，需要中共比較多的投入。而北韓核武問題於 1994 年首

¹ 1999 年 3 月 23 日，由於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 (Miloevic) 在法國巴黎近郊 Rambouillet 談判時不願接受美國所提出的條件：容許以 NATO 軍隊為主力，人數約 28,000 人的國際部隊駐守南斯拉夫全境。在美國的主導下，北約從 24 日起展開 78 天的連續轟炸科索沃 (Kosovo)。本次行動引起中共最大反彈在美國為避免中共及俄羅斯的杯葛，刻意繞過聯合國安理會的機制進行軍事行動，以致引發是人道干涉還是霸權國家的內政干涉的爭議。

² 「江澤民闡述中國的新安全觀」，中新社，1999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future-china.org.tw/spc/-rpt/tsr/ts19990327.htm/\(3/27\)](http://www.future-china.org.tw/spc/-rpt/tsr/ts19990327.htm/(3/27))。

度爆發，雖經中共居中間接斡旋暫告解決，但由於北韓對於本身政權續絕存亡的危機意識，2002 年再度爆發。本次危機發生的前題與背景，乃至國際環境的變化，都較第一次危機時更為複雜難解，如何妥善處理與化解，才能符合中共國家安全利益，正嚴格考驗中共領導人的智慧。本研究主要觀察中共在面對國際格局的變化與國家發展的需要，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其國家安全觀如何建構與演變，主要特質及核心利益為何？其國家安全觀在處理北韓核武危機中的作用。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冷戰結束後，中共的崛起，成了世界秩序的問題，也是答案。³它幾乎是讓西方國家產生敬畏，也感到憂慮的政權；⁴它自己也正在尋求國際間發揮更大作用並尋找自己的新位置。中共的崛起是「和平發展」？抑是破壞現狀的「威脅者」，西方國家為何對中共充滿畏懼？西方國家究竟是畏懼其日漸強大的綜合國力，抑是不瞭解其意圖，未來是敵是友不得而知，似乎是當前國際關係學界及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我們應當如何解讀中共的外交語言、如何界定中共在新世界的位置及正確掌握中共未來發展方向？中共自 1996 年起一再宣示的「新安全觀」似乎是一個有脈絡可循的線索。

國家安全觀是人們對國家安全此一抽象概念的一種主觀反映，是基於人們對國家安全環境與狀態等因素的認識與判斷，⁵是國家安全政策和安全戰略的基礎。就中共國家安全觀而言依其發展時期不同，約可概分為「傳統安全觀」時期與「非傳統安全觀」時期，⁶而「非傳統安全觀」劃分的時期則與中共當局提出「

³ Samuel S. Kim,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3.

⁴ 參閱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台北：月旦，1999 年）頁 8；Warren Christopher, "Standing Firm with China," in Warren Christopher,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Shaping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Er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25-431.

⁵ 沈偉烈、陸俊元主編，《中國國家安全地理》（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頁 84。

⁶ 子杉，《國家的選擇與安全—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安全觀的演變與重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 年 1 月第 1 版），頁 206。

新安全觀」時期大致吻合；不同時期國家安全觀在意識形態作用不同，因而國家安全觀與國家利益會受主觀因素影響。⁷國家安全觀與安全現實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存有落差。應當如何從對安全現實的理解，來瞭解一國的安全觀，並且掌握安全觀與安全現實之間的落差，是本研究的主要重點。

中國國家安全觀的建構與演變的關鍵時期，是在冷戰結束後。這一時期即使在經濟全球化浪潮席捲下，美國對北韓的政策卻仍維持冷戰的思惟，2001 年小布希入主白宮，在柯林頓政府時代曾將北韓定位為「無賴國家」(Rogue State)，秉承保守主義理念，復於 2002 年「國情咨文」中，將北韓、伊朗、伊拉克等國家貼上「邪惡軸心」(The Axis of Evil) 標籤，朝鮮半島宛如一塊冷戰「活化石」。2002 年 10 月新一輪北韓核武危機爆發，朝鮮半島局勢驟然緊張。為解決危機，在中共籌措下，中、美、俄、日、北韓、南韓六國舉行了四輪「六方會談」，危機暫獲些許緩解。從中共的國家利益角度出發，中共當然不希望北韓發展和擁有核武；中共當然也可以基於國家利益、東亞區域安全角度，直接對北韓施壓，但中共卻採取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介入北韓核武危機。中共對北韓核武危機從 2003 年 1 月 10 日前之幾乎袖手旁觀的態度之後的到積極斡旋作法，⁸雖有令世人耳目一新之感，其間轉折卻耐人尋味。安全戰略與外交政策是安全觀念的反應與實踐，何以同樣的「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安全觀，同樣的北韓核武問題，中共卻有不同的認知與作法，是什麼因素使中共政策出現如此重大的轉變？能否從中共對北韓核武危機的認知與態度這一安全現實來檢驗中共國家安全觀的發展，建構實際應用，是本論文最想嘗試的目標。

中共自從江澤民 1999 年 3 月 26 日在瑞士發表「推動裁軍進程，維護國家安全」講話大力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後，此一「新安全觀

⁷ 閻學通，《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0-12；閻學通，《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17、195-196。

⁸ 朱鋒，《中國朝鮮核政策和策略變化》，〈中國戰略，2004 年 7 月 20 日，第 3 期〉，頁 2。

」便成爲中共建構世界新秩序的核心論述；2002年7月31日，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⁹全面系統地闡述中共在新世紀下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並且明列於「16大」的政治報告之中，顯然新安全觀已經成爲中共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也成爲中共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換言之，此一新安全觀已形成影響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內在變量，因爲國家選擇或踐行何種安全戰略，界定與因應國家安全狀況的重要因素。¹⁰中共是當前台灣地區最大的安全威脅來源，研究中共的國家安全觀，是正確剖析與預測中共對外行爲與對台政策的關鍵，應對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依據。

貳、研究目的

本論文主要目的是探討冷戰結束後，中共面對國際格局變化、國內情勢走向，及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升高下，國家安全觀相應的變動與演化所形塑的當前的中共國際地位；以及中共如何在新安全觀的指導下，運用其當前的國際地位，介入北韓核武危機的處理。

自冷戰結束後，中共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使中共對國家安全的認識也發生相應的改變。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綜合國力持續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而以美日爲主的「民主國家」對於日漸崛起的中共強權的看法相當分歧。「中國威脅論」、「和平崛起」與「北京共識」等價值對立的論述，¹¹不時浮沈，對中共國家未來發展，既充滿希望，又滿佈疑懼；既企圖將中

⁹ 文件全文參閱中共外交部網站www.fmrc.gov.cn。

¹⁰ 子杉，《國家的選擇與安全－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安全觀的演變與重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1月第1版），頁1。

¹¹ 新華社《參考資料》編輯部翻譯，《雷默報告》。2004年5月11日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發表高盛公司高級顧問Joshua Cooper Ramo撰寫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研究報告，認爲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適合於中國，也適合於追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發展中國家仿效的榜樣。請參見東亞經濟評論，<http://www.e-economic.com/info/1181-1.htm>。

共融入世界，又害怕國力增強的中共，將挑戰當前國際權力結構，形成國際安全潛在的威脅，始終無法就中共的定位達成共識。¹²

而中共在國際上面對美日等國漂浮不定的對待與處遇，在國內亦有不同因應策略，或主張一邊參與經濟全球化，一邊獨立自主的發展。¹³而中共的國家發展戰略，向來深受國際政經變遷的影響，而且也左右其內外政經政策。中共的國家安全觀，必然有其因應國內外政經變遷的考慮，也有整合國內與國際層次的策略性思維。

尤其在北韓核武危機問題上，中共藉召集六國多邊會談之機，進一步擴大其在亞太安全事務上之影響力及發言權，挑戰美國長久以來主導亞太安全事務的霸權地位。基本上而言，美中關係在當前國際新形勢下，雖有共同的利益——共同制約北韓發展核武及武器擴散，目前確是合作關係，但是兩國根本價值、利益都不相同，雙方關係改善只是暫時現象。

就中共而言，在美國與各國一再請託下出面斡旋北韓核武危機，亦有其本身的戰略考量與安全需求。從地緣政治上來說，北韓是中共東北邊界安全的緩衝地帶，朝鮮半島的形勢變化關係到東北亞、乃至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北韓核武問題處理不好，出現新的戰端，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共，不但影響經濟發展，也對中共成為新世紀的大國地位，造成衝擊。如果順利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危機，有利於杜絕美國勢力染指朝鮮半島，鞏固中共在朝鮮半島的利益，對形塑中國的大國地位，具有重大的意義。

¹² 2005年6月4日美國國防部長倫斯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太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說，批評中國快速發展軍力，國防支出大幅增加，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產生威脅。出席同一論壇的日本防衛廳長官大野功統亦呼籲中國公開更多有關軍費開支的詳情。請參見”Rumsfeld: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a Threat,” The Associated Press, June 4, 2005, see: <http://taiwansecurity.org/AP/2005/AP-040605.htm>；《中國時報》，94年6月5日，版6。

¹³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鄭必堅在「博鰲論壇」介紹「中國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時強調，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所開創的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又適合時代特徵的戰略道路。這套道路的基本特質是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見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和亞洲的新角色》，<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6863>。

中國大陸的學者一般認為，中共新世紀的安全概念，主要是以維護中共發展為核心的世界性概念。中共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張文木認為，對於中共國家安全係數的評估基點，不再以建立本土安全為主，而應建立由本土幅射於世界的國家利益安全之上。此外，就維護中共國家安全的作為而言，也應從封閉的獨守家門的模式，轉變為積極進取和開放的模式。¹⁴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朱聽昌亦以地緣政治觀點提出中國的安全環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中國的安全利益範圍不斷變化，雖然目前還只是一個具有全球影響的地區性大國，中國對安全的關注還侷限於週邊，但隨著中國走向世界大國以及與外部世界交往的緊密，中國的安全利益在拓展，中國對安全的關注不得不思考跨國性和全球性的因素。¹⁵

國家利益的界定決定其所欲採行的手段，在改革開放後，中共的國家安全概念及其實現手段是以中共國家發展利益為主要訴求。當前中共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和政治安全鬥爭，而是以綜合國力大小高低為主題。如何建構一個和平穩定的週邊環境，以利中共從事經濟建設，以達成提昇綜合國力的國家目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叢鵬即認為，中共安全戰略關注的基本目標主要即在通過加速發展經濟和綜合國力的基礎之上，並應積極參與雙邊或多邊安全合作，以掌握國際安全合作規則的制定，同時積極拓展周邊外交，營造一個和平、和諧、合作的周邊安全環境。在這種背景下，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定自是成為中共國家安全的核心，50年代建政之初，韓戰即使中共東北邊境陷入危險境地，對中共國家發展影響至鉅；而當前的北韓核武危機在經過十餘年的周折，仍未得到最終的解決，成為中國安全的一大隱憂。

16

¹⁴ 張文木，《中國國家安全哲學》，〈戰略與管理〉，北京，2000年第1期，2000年2月，頁31。

¹⁵ 朱聽昌主編，《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1月，頁4。

¹⁶ 叢鵬主編，《大國安全觀比較》，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7月，頁286~288。

綜觀中共學界對中共國家安全觀的建構與對北韓核武危機的認知，皆是從現實主義的地緣政治觀點出發進行分析，認為國家要生存發展，就必需提昇綜合國力；要提昇綜合國力，必需營造一個穩定的週邊環境以利經濟建設。而當前的北韓核武危機，是影響中國週邊安全環境最大的變數，應該認真嚴肅以待。

第二節、理論探討與文獻回顧

壹、理論探討

安全觀是安全主體對安全環境整體概念的反映，是人們對安全問題的主觀認識，是對威脅來源、維護安全的手段綜合判斷。¹⁷冷戰結束後，世界形勢發生深刻變化，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上升，人們對於安全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國家安全觀亦相應不斷進行變動和調整。不少西方學者根據自身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對安全主體、內容和手段給予不同的解讀。而本文則以探討中共如何因應冷戰後時代快速變遷的國際環境，建構其新安全觀。研究中共國家安全觀必需對國際關係理論中相關流派及中共本身對這一問題的論述進行深入探究，才能把握問題的本質。本研究針對西方國際政治的主流理論所建構的安全觀及中國大陸根據本身條件發展的國家安全觀予以系統的闡述與分析。

一、現實主義安全觀

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現實主義一直在國際關係研究，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其流派又可分為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及新古典現實主義等。這三種現實主義安全觀一脈相傳，是安全研究最完整的理論體系。一般認為，現實主義安全觀關注兩個問題：一是如何解釋國家為生存所採取的行動的普遍原因與具體原因；一是如何解釋國際體系的變化及其動力來源。¹⁸現實主義安全觀把國家作為國際政

¹⁷ 李學保，《全球化視角下的安全：兩種不同的理解及分歧的原因》，〈教學與研究〉北京，2005年第7期。

¹⁸ 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t,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5th edition，北京大學出版社原版影印，2004年9月

治的主要行爲體。¹⁹

關於現實主義安全觀的基本內容，Michael Nicholson認為，現實主義安全觀有四個基本主張：第一，國際關係中的主要行爲體是國家；第二，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第三，權力安全是相互行動的主導模式；第四，自衛是國家維護安全首要手段。John Mearsheimer認為，現實主義安全觀由三個核心要件組成：一是把國家看成安全的主要行爲體，大國主宰和決定國際政治的秩序；二是大國行爲主要受其外部環境而不是內部屬性的影響，國際體系的結構對國家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影響；三是對權力的追求成爲支配國家的思維，國家爲權力而競爭，戰爭有時成爲一種可被接受的治國手段。²⁰Francis Fukuyama認為現實主義安全觀有四項規則：第一，國際不安全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應當通過對潛在敵人的權力平衡來達成。由於戰爭是國家之間爭端最終解決手段，因此國家不得不擁有足夠權力來保衛自己；第二，盟友和敵人應當根據他們的權力來選定，不可依據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的內在特徵來選擇；第三，政治家在認定外來威脅時，應當更注重對方的軍事實力而非對方的意圖。從某種意義上講，意圖是始終存在並處於不斷變動和調整之中，即使某個國家今天看起來很友好，明日也可能翻臉。第四，在對外政策中必需摒棄道德主義。²¹

現實主義是安全研究的一個極爲重要的理論，Hans. Morgenthau曾深刻指出「無論現實主義理論受到多大的誤會和曲解，它對政治問題所抱持的知識態度和道義態度是無可辯駁的。」²²現實主義安全觀在安全研究和實踐中之所以具有廣泛深遠的影響，是與其鮮明而又悲觀地強調利益、衝突和權力等這些有關人類本性的東西有關。

，頁 69。

¹⁹ 約瑟夫·奈，《理解國際衝突：理論與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頁7。

²⁰ 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頁16~17。

²¹ 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頁280~283。

²² 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鬥爭》，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頁17。

二、自由主義安全觀

從安全研究角度來看，自由主義安全觀與現實主義安全觀是相對的，也是安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家族。自由主義安全觀是由理想主義演化而來，並推衍出新自由主義安全觀。自由主義安全觀主張自由、合作、和平與進步，並強調人性的善良、理性以及人際關係的和諧光明面。

理想主義安全觀是以兩個核心假定為前提：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及戰爭是可以避免的。認為人性是可以通過教育得到改造，相信人類總是不斷進步和往好的方向發展的，最終走向文明。戰爭主要是由於國內和國際體制不完善造成的，和人性無關。一旦人類教育程度提高，就不會使用武力而是用協商方式去解決問題。從這兩個假設出發，理想主義安全觀所提出主要觀點為：第一，通過調和利益，可以避免戰爭，因為國際社會是有秩序的；第二，應該建立對國家行為體具有約束和控制能力的國際組織，確立國家安全保障機制；第三，傳統的均勢是有局限和靠不住的，理性選擇是用集體安全取代。第四，國際法可以保證世界和平與安全，理想主義堅信國際法可以規範國家行為；第五，國際道德和公眾輿論也是實現國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基此可以發現，理想主義安全觀是建立在人性可以通過教育而得到改造，國家利益可以調和這種假設之上。國家安全之所以會受到威脅是因為世界處於無政府的狀態，只要健全國際體系，或建立世界政府，通過國際法和國際輿論的力量，世界安全就可以得到實現和保障。但由於主張過於「理想」，在現實中很難得到完全的實現，使得理想主義安全觀的影響具有很大的侷限性。

在與現實主義的論戰中，自由主義吸收了現實主義很多東西，在一定程度上，新自由主義安全觀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是特別強調制度或合作對於調節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行為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是強調國家在安全合作中的絕對獲益。

從第一點看，現實主義強調自助的安全理論，新自由主義則主張跨國的相互聯繫。Keohane和Nye所提出的「複合相互依賴」理論，是以國家和超國家關係為研究對象，實際上就是一種安全關係的描述。相互依賴是指一個體系中的不同行為體或事件的相互影響，包含有三個特徵：一，各社會之間的多管道聯繫，包括政府菁英之間的非正式聯繫或對外部門的正式安排等等；二，軍事問題並非始終都是國家間關係的首要問題，而國內與國外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三，當複合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時，軍事力量不再具有首要作用。²³

從第二點看，新自由主義安全觀認為，今天各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已使戰爭的可能性大大減弱。這是因為國際經濟的連繫和貿易的發展，使國家通過經濟發展獲利已經超過通過戰爭的獲利，只要世界上有相當一部分的國家能夠在經濟上長久地保持相互依存的關係，世界和平的前景就是樂觀的。

嚴格來說，自由主義理論體系的完整性不如現實主義，而且相關主張在現實中也無法完全實現，但其主張中包含人類理想的某種成分，代表人類對現實和未來的美好期待，代表國家安全的一種發展方向，是值得重視的。

三、建構主義安全觀

建構主義安全觀是冷戰後興起另一個安全研究的面向，提出國際安全關係的新視野，是安全研究領域一大突破，成為安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理論。具體而言，建構主義在安全問題上的基本觀點歸納如下：

第一，建構主義安全觀是建立在社會建構基礎之上的，認為安全是一種社會建構：

在安全觀的有關概念上，建構主義強調的是社會建構對國家行為和國家關係的影響。在建構主義者看來，行為者所從事的行為並不是物質世界決定或構成的

²³ 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伊，《權力與相互依賴》（第3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頁25-31。

，在物質世界之外還存在一個意義與知識的世界，這個世界包含了行為者對世界的解釋和理解。建構主義社會結構包含三個主要因素。一是共有的知識。共有知識是指行為體在一個特定社會環境（安全背景）中具有共同的理解和期望。共有知識建構行為體的身分和利益，確定雙方或多方的安全關係。國際關係「安全困境」概念，用建構主義觀點闡述：主體間期望使行為體間相互猜疑，使他們對對方的動機和意圖作出最壞的估算，反之亦然。因此，如果一方採取不具侵略意圖的某種軍事行動或只是擴充軍備，另一方必然感到威脅，同時採取相應的措施，結果就是安全困境。但從安全共同體角度來說則是不同的社會結構：行為體的共有知識建構彼此的高度相互信任，保持高度的相互理解，雖然彼此之間不可避免存在著利益衝突，但雙方都能有效地克制，以友好的觀點理解對方的意圖，相信可以通過和平途徑予以解決，結果就是安全共同體。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體都可以在無政府狀態中產生和存在，無政府狀態本身不能構成解釋原因。二是物質性因素的作用。建構主義認為結構包含物質性因素，如人的身體、國家的實力等是客觀存在的，是無法轉化為觀念性因素。但是物質性因素本身意義十分有限的，物質因素只有通過社會性結構才能對行為體的行為起到有意義的影響。建構主義理論最常引用的一個比喻是英國和朝鮮都擁有核子武器，但是哪個國家的核子武器對美國構成威脅呢？三是社會結構存在的條件。社會結構的形成和存在是社會體實踐即互動的結果。行為體之間的互動造就了社會建構。因此，社會體的結構是動態的，可以建構一種結構，也可以脫離這種結構，建立另外一種結構，例如國家可以建構安全困境，可以建構安全共同體。

第二建構主義安全觀重視建構行為體的互動，挑戰傳統安全理論對安全主體和安全領域的設定。

建構主義安全觀重視施動者（如國家）和結構（如國家間關係或國家對相互關係的理解）的互動。建構主義學者Barry Buzan在《新安全論》一書中，認為在後冷戰時代的安全事務中，無論是安全行為主體還是其指涉對象都遠非傳統安

全理論的安全行爲體－國家所能夠承載的。布氏將安全領域劃分爲軍事安全、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及環境安全等五大領域。²⁴布氏認爲，當軍事安全不再被視爲唯一的安全形式時，人們開始對安全進行新的思考，安全的議程也被拓寬了。²⁵

第三，文化對行爲體的安全行爲具有規範作用。

建構主義學派指出，不能將國家的行爲觀念和行爲實踐作單一的解釋，不存在單一的因果性，主張從歷史、文化、制度和經濟等多樣性綜合因素認識國家的安全行爲。

建構主義安全觀對冷戰後的一些問題提供具有說服力的解釋，例如共有知識的觀點、互動在構建安全文化中的作用上的觀點等，都爲在國家間關係中倡導互信、構建合作安全共同體，爲構築新型安全觀提供了理論基礎，對促進國際社會在安全研究方面的合作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建構主義還在發展當中，目前只是建立起一種較爲系統的方法，但是已對新型安全研究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

四、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觀

相對於以上三大國際政治主流理論的安全研究論述，中共的國家安全觀，尤其是中共於 1996 年 7 月東協外長會議上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的安全觀念」，²⁶其後在國際場合中一再宣示的「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雖然只被視爲一個形成中尚待充實的概念，²⁷但歷經十年的推動與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安全觀的論述，已逐漸成型。

²⁴ 巴瑞·布贊等著，《新安全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頁 29-32。

²⁵ 同前註，頁 259。

²⁶ 《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2002 年 7 月 31 日東盟外長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向大會提交《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解放軍日報網路版
<http://www.old.jfdaily.com/epublish/big5/paper39/.../class003900001/hwz637483.htm - 2005/11/27>

²⁷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中共十六大之後內部暨國際環境評估〉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 年，頁 4-2-11。

基本上，中共認為，「國家」、「國家主權」是「國家安全」概念認識的原點。由主權中的自保權引伸而出的「國家安全」概念之間存在著內在邏輯聯繫，即國家安全的最高目標是保衛國家主權，其主軸是保衛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²⁸此一概念下使得本國的安全與世界的安全呈現相悖離的情況，使中共的國家安全觀完全建立在國家的「生存」安全上。但在後冷戰時代，中共的國家安全概念已不再僅僅是生存的意義，而是具有發展的概念意涵，對中共而言，發展利益之所在，就是今日中共國家核心利益之所在，而國家核心利益的威脅就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因此，中共對國家安全的關注，應從傳統的維護本土安全的基礎上，調整為維護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利益的綜合性安全。基本上言，由於對政治文化傳統的理解、現實威脅的感受和安全利益的認知的不同，中共在看待冷戰後的安全問題上也積極塑造自己的新安全觀，必需以宏觀的視野來看待傳統中共最重視的安全問題。

(一)官方觀點

中共「新安全觀」概念的提出，是在北約東擴，美、日出臺「安全合作新指標」以及美國介入台海危機等國際大背景下，中俄等五國首腦聚集上海，討論邊境地區軍事互信問題，這是中共考慮新型安全問題的發端。²⁹繼之中共於 1996 年 7 月 20 日在東協外長會議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的安全觀念」，被視為中共提倡「新安全觀」的濫觴，1997 年 4 月 23 日江澤民在俄羅斯發表「『中』俄關係與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中，首度宣示「新安全觀」政策，認為必須棄「冷戰思維」，反對集團政治，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和爭端，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以對話協商促進相互了解和信任，通過

²⁸ 張文木，《中國國家安全哲學》，〈戰略與管理〉，（北京），2000 年第 1 期，2000 年 2 月，頁 24。

²⁹ 江澤民，在杜尚別出席「上海五國」元首會晤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00-07-07。

雙邊、多邊協調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³⁰同日江澤民在俄羅斯杜馬發表的演講中，向全世界闡明了中共關於維護國際安全的基本主張，即各國有權根據本國國情，獨立自主的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各國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一切分歧和爭端，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加強和擴大經濟、科技、文化的交流與合作，促進共同發展與繁榮。中共認為這是創造性的繼承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並以此為基礎確立「新安全觀」。

中共在 1998 年首次公佈的國防白皮書（Defense White Paper）中，宣示中共新安全觀的要點包含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經濟合作、多邊主義的參與、戰略夥伴關係的意涵。並特別強調經濟全球化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其後 2000、2002、2004 年版的國防白皮書連續三度重申新安全觀概念。

1999 年 3 月 26 日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瑞士日內瓦裁軍會談，以及 2000 年 9 月在聯合國千禧年高峰會上發表演說，³¹又分別闡述中共新安全觀的立場。2002 年 2 月 2 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王毅在慕尼黑國際安全政策會議上演講指出以新安全觀為基礎，中國的安全政策首先著眼於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同時服務於經濟建設，努力確保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尤其是良好的周邊環境。這一政策有三個目標：一是保持中國自身的穩定與發展；二是維護周邊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三是促進國際安全對話與合作。在維護國家主權和確保發展基礎上，強調對外政策的和平性、軍事戰略的防禦性、國際安全的合作性，承認和尊重世界的多樣性。90 年代中後期，中共領導人明確提出國際社會應樹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將「聯合國憲章」的宗旨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維護國際安全的政治基礎，將互利合作、共同發展作為維護國際安全的經濟保障，各國共同努力營造長期穩定、安全可靠的國際環境。

³⁰ 《中國和俄聯邦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新華社〉，莫斯科 1997 年 4 月 23 日電。

³¹ 《在聯合國千禧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0 年 9 月 7 日，第 1 版。

持平而論，中共「新安全觀」雖強調「各國有權根據本國國情，獨立自主的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各國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一切紛歧和爭端，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加強和擴大經濟、科技、文化的交流與合作，促進共同的發展與繁榮」。³²但就中共在當前美國超強建構的單極世界體系觀察，中共大力推動「新安全觀」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客觀條件均未成熟，極可能被美國視為挑戰其霸權、與其競爭國際強權的對手。

33

(二) 學界觀點

傳統上，由於歷史上中國被外敵入侵的史實，多數中共學者認為安全意味著國家的生存不受其他國家的武力威脅，國家生存成為安全所要保護的第一要務。1990 年代初期，隨著國際情勢及國際安全環境的轉變，中共學界開始針對全球化趨勢及國際環境的變化，調整新的國家安全概念，強調在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中，應該具有動態的安全觀。亦即，時局變動是常態，沒有絕對的和平，區域衝突或其他因素造成的衝突仍不可避免，但並不必然引發如冷戰期間的大規模戰爭。學者李少軍認為，面對全球化下國與國之間交叉複雜的關係，一個國家應該意識到它已經不可能是完全獨立的行動者。以國家之名處理任何事務，都會立即牽動國際互動網絡，引起國際反應。所以，國家謀求安全，不可能是純粹的單一國家行為，而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國際色彩，從而構成國際安全的一部分，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是互通的。³⁴

後冷戰時期中共新安全觀的發展，由於受到 1997 年 7 月亞洲金融風暴、1999 年 3 月科索沃戰爭及 2001 年 911 事件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王逸舟對於新安全觀有其獨到的見解，認為在全球化的潮流下，一

³² 同註 26。

³³ 施子中，《911 事件後國際情勢發展對中共「新安全觀」之衝擊》，戰略與國際研究季刊第 4 卷第 3 期，民國 2002 年 7 月，頁 1。

³⁴ 李少軍，《論安全理論的基本概念》，請參見

http://www.iwep.org.cn/chinese/jigou&renyuan/guojizhengzhi/paper/lun_an_quan_li_lun.pdf

個國家要保障自己的安全，一定要採取一種願意自我轉變的、動態的、開放的和進步的新安全觀；而是否能真正採行這種新安全觀，則取決於該國家自我改造、自我創造，與自我開放的能力和程度，它們不僅是在所謂的器物層面，更必需深及該國的體制層面，甚至觀念層面。強調安全性的具備與否，和一個國家的體制密不可分，也就是一國制度性的穩健與否是一國是否獲致國際尊重並獲得和平的關鍵。³⁵此外，在全球化下，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關係密切，一個國家的安全與鄰國的安全，多邊地區的安全乃至於全球安全均存在互利關係，它們之間存在既平衡又制約的關係，而如何審度、協調各國的自主發展與全球持續發展之間的平衡點將是各國最大的挑戰與難題。

因此，中共學者所認定的國家安全已經由傳統強調的軍事層面的安全觀逐漸轉變成綜合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層面能正常發展的全面性國家安全，是一種動態的安全觀。雖然新安全觀在定義上仍然不夠明確，但儼然已經成為當前中共學界的主流意見。

貳、文獻回顧

一、有關新安全觀之研究

在冷戰結束後，傳統安全威脅演進到非傳統安全，有關安全研究正逐漸取代戰略研究，成為當前國際政治研究的熱點。但有關安全研究主要是針對國際格局的改變與對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因素的變化，專門針對國家安全觀研究的著作並不多見，而針對中共國家安全觀之研究更如鳳毛麟爪，謹綜整相關論述如次：

大陸學者觀點

子杉，「國家的選擇與安全—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安全觀的演變與重構」，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

全球化作為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正深刻改變社會進步方式和人類文明的發

³⁵ 王逸舟，《樹立世紀之交的國家安全觀》，瞭望新聞週刊（北京），1999年第37期，1999

展方向，成爲影響國家行爲的一個重要變量，使以國家爲主體的國際體系發生深刻變化，並以其自身邏輯改變人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和理解，從而出現了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安全觀的演變與重構問題。爲了適應新的國際安全環境，應對新的挑戰，需要重新審視和研究安全與戰略理論，而建構既能回答現實問題，又能合乎長遠要求的國家安全觀，顯然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且緊迫的課題。

沈偉烈、陸俊元，「中國國家安全地理」，時事出版社，2001年

主要探討中國在冷戰後伴隨安全概念的發展形成對國家安全觀念的變化，中國政府重新認識安全問題，調整安全觀念以制定相應的安全戰略。

台灣學者觀點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中共十六大之後內部暨國際環境評估」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年。

主要在描述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從系統的觀察中尋求中共對此關係關注的重點。認爲中共關注的核心在於同盟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產生的作用，對中共而言，如何與使美日關係處於一定的平衡狀況，不致因爲兩國關係過於密切而導致日本成爲政治、軍事大國，或是兩國關係陷入衝突，促使日本重整軍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朱蓓蓓，「全球化與中共安全觀：轉變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第6期，民國92年11、12月。

後冷戰時期由於國際環境的變化，使得安全概念產生轉變，逐漸轉變爲綜合性、多面向的安全觀。中共面對此一趨勢，在「和平與發展」政策下，相應調整其國家安全觀，並提出「新安全觀」作爲國家安全戰略與對外政策的基調。

趙崇明，「中共國際戰略指導原則——『新安全觀』的環境因素」，共黨問題研究，第5卷第9期，民國88年9月，頁4-17。

本文採用大衛·伊斯頓 (David Easton) 的政治系統分析概念，探討中共提出「新安全觀」的國際戰略指導原則過程中，國內、外環境因素。在國內因素方面，趙氏認為有經濟發展的需求，也有分離運動的危機，更牽涉到黨軍關係的拉扯。在國際環境因素方面，則有國際格局改變的影響，也有美國對中國政策調整的制約及核武的威脅等「輸入項」所獲得的結論。

吳健民，「中共的國家『新安全觀』對亞太區域秩序之影響」，空軍學術月刊 - 578 2005/7/6

對中共而言，安全觀的形塑與對國內與國際的安全環境認知有關。中共學界針對國際情勢轉變、安全觀念的論調，強調在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中，應該具有動態的安全觀，亦即世局變動是常態，沒有絕對的和平，區域衝突或是其他因素造成的衝突仍不可避免，但並不必然因此引發如冷戰時期的大規模戰爭。

二、有關北韓核武危機政策的研究

大陸學者觀點

朱鋒，「六方會談後的北韓核武危機：問題與前景」，北京，現代國際關係，第 9 期，2003 年。

六方會談暫時未能在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上形成實質性的突破，但會談畢竟為外交解決北韓核武爭端打開了大門。由於六方會談已經啟動，近期內北韓核武問題可能呈現「冷危機」的態勢。中共雖非北韓核武危機的當事國，但無法只充當旁觀者。北韓核武危機如果失控，其悲劇性結果很可能殃及中國，損害中國經濟建設所需要的穩定的周邊環境，危及中國的國家利益並將威脅到中國所在的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安全與繁榮。

朱鋒，「中國朝核政策和策略的變化」，北京，中國戰略，第 3 期，2004 年 7 月 20 日。

中共對北韓核武問題從旁觀到積極斡旋，重要轉折始於 2003 年 1 月，也即

北韓宣佈退出《禁止核武擴散條約》(NPT) 之後。1 月 10 日，江澤民應約與布希通電話，首次表示「我們不贊成朝鮮退出《禁止核武擴散條約》，我們主張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我們認為，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制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對話是解決朝核問題的最有效途徑。」朱鋒分析中國採取積極斡旋政策的原因有 1. 立足於對國家利益的全面把握，希望化挑戰為機遇；2. 對周邊環境和地緣戰略的考慮，避免戰爭，維護穩定；3. 避免核擴散和軍備競賽，體現維護國際體制的形象。

郭飛熊，「中國在朝鮮核危機中的角色和目標」，北京，中國戰略，第 3 期，2004 年 7 月 20 日。

對於北韓，中國兼施壓者、呵護者、忠告者、援助者、約束者等多種角色於一體，促使北韓走上多邊談判軌道。對於美國，中國既是制衡者和牽制者，又是幫助化解核武危機的斡旋者。2003 年，中國胡溫政府採取罕見的外交主動，促成了美國和北韓在多邊框架下的對談。中國實施主動行為的動因之一是美國對中國的斡旋要求及對北韓不斷升級核危機可能擦槍走火的憂慮。主動外交使中國在核武危機中謀求的國家目標進一步地明朗化。維護東北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爭取朝鮮半島無核化、防止北韓向其他國家尤其是中東擴散核技術等目標應是中國主要的戰略追求；次要目標則是保有北韓作為安全緩衝的地位，同時伺機拉近韓國和中國的距離、盡可能使日本無法將未來的核武化建立在北韓核武化的藉口上及防止臺灣分離勢力利用北韓核武危機肇事等。

台灣學者觀點

劉德海，「北韓核武、六邊會談與中國大陸之角色」，「第五屆兩岸遠景論壇－東亞區域整合與兩岸關係」研討會

中國大陸在美國初倡六邊會談時，表現並不積極，但在第一次與第二次六邊會談召開之後，六邊會談逐漸成為東北亞安全的對話機制。中國大陸也才開始慢慢開始扮演斡旋的角色。中國大陸的目的有三：形成中美共治東亞的現象以矮化

日本；多邊對話機制若成功建立，中國大陸在亞洲地位無人能挑戰；藉機拉攏美國，以換取如台灣問題的其他議題的合作。

三、小結

由以上的文獻回顧可知，目前研究中共國家安全觀者已大有人在，但多數集中在中共面對後冷戰時期國際局勢改變，強調以軍事武力為主的傳統安全觀已轉向非傳統安全觀，在實踐方面則以 1996 年「上海合作組織」為典範，以東協加一的東亞安全機制為目標，但由中共對北韓核武危機的政策來驗證其國家安全觀則不多見，主要集中在中共處理北韓核武問題的立場與預測北韓的動向，缺乏將兩者連接在一起的專論。本研究試就國際政治體系結構入手，以地緣政治觀點來探討中共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如何面對一個具有歷史血緣關係、具有重要戰略價值，但又倨傲不馴的週邊鄰國，當前倡導之「互助、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是否符合中共國家發展的重要利益。而中共在處理北韓核武危機問題上所秉持的安全觀是特例？抑或是通則，或那一部份是特例，那一部份是通則，亦屬本研究嘗試突破的範圍。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壹、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採用「非實驗性研究方法」(Non-experiment Method)中的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Method)，對獲得之相關文獻的加以歸納分析。「文獻分析法」是社會科學研究法中一種十分傳統的而典型的研究方法，是指在資料蒐集過程中，透過各種既存的史料，如官方出版品、書籍、期刊、論文、報紙等相關資料來檢證對某一事物的觀點與看法，剖析其含意，以推敲其淵源及影響或找出真相。³⁶本研究即根據所蒐集到的國內外相關圖書及研究機構之參考文獻、統計數據中，逐一研讀，分析比較，進行探討其間之因果關係，期能略窺背後的真實真象，進而整理可供解釋之資料，作為本研究之依據。

貳、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 (research approach) 乃指選擇問題與相關資料的準則，亦即所採行的基本概念、模式與方法的標準。簡單說，就是研究者希望從那一個層次作為出發點、入手處，或者是著眼點，去進行觀察、分類、歸納與研析之研究。³⁷本研究主要採用體系研究途徑，再輔以傳統歷史研究途徑，對資料與事實進行分類與比較，運用結構分析架構，作深入的探討，以掌握諸多變項間之因果關係。

一、體系研究途徑

體系研究途徑是 Kenneth Waltz 在其國際關係理論的經典著作《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中提出的，主要分析的層次可分為個人、國家和國際體系。體系研究途徑是國際關係學者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政治研究的主要研究途徑。雖然在 1990 年其相關理論無法對冷戰結束之預測或解釋提出令人滿意的說明，導致後冷戰時期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方法的重大變革。

³⁶ 趙明義，《國際區域研究》，台北，黎明書局，民國 83 年 4 月，頁 3-4。

³⁷ 朱滋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民 88 年，頁 162。

但體系研究途徑所強調的「結構」約制「單元」的觀點，仍有其研究的價值，可以在研究方法上較能具有科學性地掌握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也可以得到較有系統的研究結果。本論文著重國家（中共）如何因應國際體系的變遷，而改變其國家安全的概念，進而調整其國家安全的政策，並以北韓核武危機為例來驗證北京是否將新安全政策運用到朝鮮半島的案例。

二、歷史研究途徑

歷史研究途徑係從歷史學的角度，運用歷史資料來描述分析事實，其目的是想從歷史事實描述中，尋找事實的真象加以分類比較，並進一步提出解釋。亦即旨在描述歷史事實，並指出某一特定時空發生的歷史史實，抽離其特點，以建立通則(*generalization*)或定律(*law*)。³⁸所謂定律，依照Kenneth N. Waltz的界定，是指通過觀察或實驗，得出的恆常或可能的關聯關係(*association*)。但僅抓取無限多的經驗事實，不足以產生知識，故需以理論解釋定律，滿足人們尋求預測與控制外物的慾望。此外，利用歷史資料來解釋各部分間之前因後果關係，以發掘出某一特定時空發生事實前後之關聯性，以重建過去的一種工作，特別是長時間性研究性質問題上。本研究之客體—中共國家安全觀（1996-2005），適足以利用此一研究途徑，來剖析中共國家安全觀如何演變與重構，與國際外在因素與國內發展對中共國家安全觀的作用，進而分析北韓核武危機在的中共國家安全觀發展與形塑中的定位。

參、研究範圍

時間範圍：本研究探索時間主要自 1996 年中共發表「中國的軍備控制與裁軍」白皮書至 2005 年止共 10 年間，中共在國際格局變化與內部形勢調整下，國家安全觀念的演變。

內容面向範圍：本研究內容主要以中共國家安全觀的建構與發展、內涵與特

³⁸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民國 82 年 12 月，第 8 版，頁 165。

質，及中共所倡導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安全觀在處理朝核危機中所形成的作用。

對象範圍：本研究內容指涉北韓核武危機，惟其研究主體仍為後冷戰時代中國國家安全觀，故研究之對象為中共官方的國家安全理念與實踐，因此除中共歷年來對外、對內發表之相關安全觀文件，亦包含中共致力建構新安全觀的歷程變化，以中共基於國家利益前提下，在面對及處理朝核危機的認知與相關政策，深入探討，期能窺其全貌。

資料來源：除了蒐集中共所公布之文件、年鑑、法規及重要領導人談話等公開資料外，亦包括國內外及大陸學者專家之相關論述、專書，以及兩岸三地及國外新聞傳媒之相關報導。資料來源擬蒐集自台灣大學圖書館、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國家圖書館、國科會科資中心微片資料庫、陸委會、海基會圖書資料室、中華經濟研究院等研究機構。另擬藉由網際網路搜尋國內外相關學術研究、專論、報導、數據等。此外，近年來兩岸政府機構、民間團體、傳播媒體、大學研究機構等在兩岸三地召開諸多涉及兩岸關係之學術研討會，其相關論文與研討內容，亦將為筆者撰寫論文採用之素材。

肆、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一個基本假設是安全觀是中共指導對外政策的核心概念，在此前提下探討中共在面對北韓核武危機相關政策與作為，藉以探討並驗證中共國家安全觀在外交實踐中的作用與影響。依據本研究的分析架構，全文計分六章，章節設計與內容大致陳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部分

係針對本文研究之動機、目的、研究途徑、研究方法與全文分析架構等，作一引導性之介紹。

第二章、國際安全局勢及安全理論探研

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變化至鉅。本章主要探討中共對當前國家安全環境的認知，其中包括中共如何看待當前的國際體系的「單極」世界或是「多極」社會，抑是「一超多極」的綜合體？其認知的基礎為何？其目的何在？當前威脅中共國家安全主要的來源為何？其對中共國家安全觀的形塑作用為何？在安全理論探討方面，則針對理想主義安全觀、現實主義安全觀、建構主義安全觀及具有中國特色的安全觀等基礎理論進行探討，並就相關理論對中共國家安全觀的形成與影響加以評析。續就相關文獻與著作，進行探析研討。

第三章、中共國家新安全觀的內涵與特質

探討中共自建政後國家安全觀的內涵的建構基礎及演變過程，尤其側重中共在國際活動、黨政文件中相關官方之正式報告、講話及重要學者之研究與見解，綜合歸納其特質。

第四章、中共國家新安全觀視角下的北韓核武危機

中共對朝鮮半島的戰略認知為何？北韓的戰略價值何在？而一個擁有核武的北韓對中共的國家安全具有何種意義，中共能從北韓發展核武的作為中獲取利益嗎？或中共能從處理北韓核武危機中攫取利益或承擔何種風險？

第五章、中共國家新安全觀對北韓核武危機的作用與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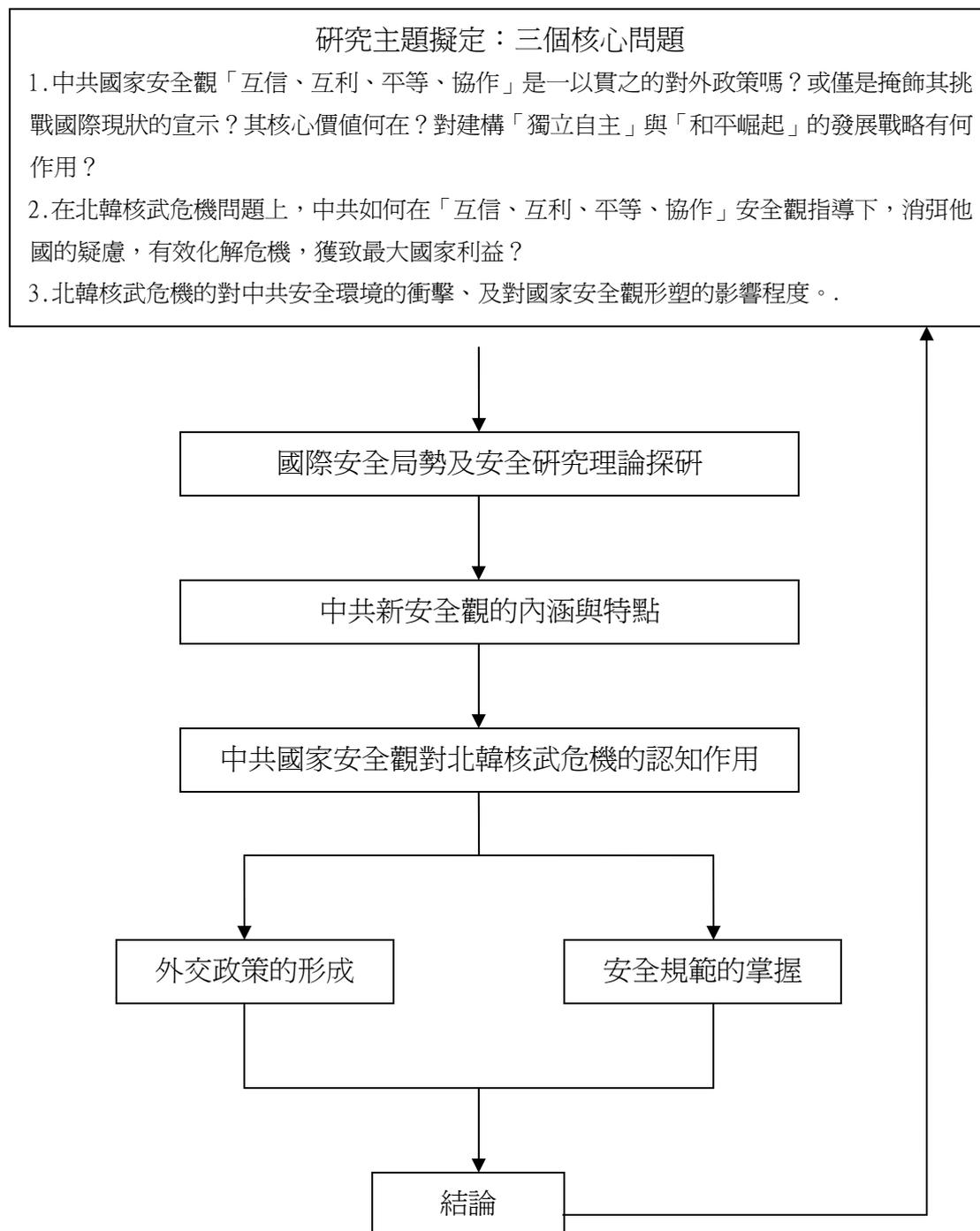
主要分析中共「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在處理北韓核武危機政策上，能否發揮指導作用？中共是否在國家安全觀指導之下，對北韓核武危機採取一致性的政策與作為。

第六章、結論

總結前面各章的分析，提出研究心得及後續展望。經以中共對北韓核武危機中採取的方策，檢驗中共的全力倡導新安全觀，可以發現中共倡導的新安全觀基本上是在國綜合國力不足以與世界霸權的美國競逐的情勢下，基於當前致力經濟建設所需要的一個和平穩定的週邊安全環境，所提出的一個主觀性、階段性的對

緒論

外政策，基本上仍是現實主義均勢理念的產物，但為因應國際情勢的發展及安全理念的變化，中共採取的部分政策，已有建構主義的色彩。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第四節、研究限制

一、安全觀是連續且動態的主觀認知，中共國家史觀是建立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基礎之上，其認識論與方法論是基於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是中共的世界觀、認識論，更是思惟方法。與西方乃至台灣學界的思維理則，存在重大落差。如何克服思維理則的不同、邏輯解讀的差異，是本研究亟待克服的問題。

二、安全研究與外交政策研究，均涉及國家實務運作層面，國家為獲取最大利益，對於決策過程與相關背景因素，都視為「國之重器，不可示之於人」，外人難窺堂奧。再者中共政權之極權政治之本質，相關信息之傳遞，較之民主開放之國家，尤為閉塞，更加限制相關資訊之取得。本研究雖耗時費力蒐集中共有關文件、報導，但終究是經過層層過濾及篩選，並且加以處理後之外交辭令，很難究其真意。為降低解讀之誤差，只有儘可能擴大蒐集資料範圍，惟囿於時間及蒐集能力的限制，終難獲得全面且深入的第一手資訊，是為本研究最大限制。

三、在理論層面上，安全研究受到冷戰結束與全球化的影響，已由傳統安全研究進入非傳統安全領域，層面涵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社會安全與環境安全五大方面，³⁹範圍之廣，對於任何研究者都是一項挑戰，更何況是在職進修的筆者，雖戮力以赴，但仍難免命題不夠周延、內容欠深入之感，猶待假以時日繼續深研。

四、朝鮮半島及北韓核武危機向為我國家安全研究較不重視之區域與問題，除少數學者外，官方鮮有觸及，遑論探及中共對朝鮮半島發展之政策之關心，對北韓核武問題之研究，更屬少見，因此本研究相對較為冷僻，可蒐集之資料與請益之對象相對缺乏，亦為本研究之重大限制。

³⁹ Barry Buzan, Ole Waever, Jaap De Wilde eds.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7.

